

美与生命美学的寓言化书写

——关于刘诗伟长篇小说《一生彩排》

□王春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刘诗伟这部字数多达30万字的《一生彩排》是一部征用了悬疑因素的长篇小说。整部小说共分为上中下三卷，每一卷的故事情节都围绕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和一个带有悬疑色彩的问题展开。上卷的时间节点是1983年，其中的悬案是一个为众多男性所爱慕追逐的女大学毕业业生刘虹女遭遇强暴未遂后的失踪。中卷的时间节点是被称为千禧年的2000年，其中的悬案是年轻一辈的小刘虹女的个人身世之谜。下卷的时间节点到了2017年，其中的悬案是一座被意外发现的“虹女之墓”的修建者到底是谁。然而，尽管存在着如此明显的悬疑因素，《一生彩排》却不能因此被看作是一部悬疑小说。借助悬疑因素，作者真正意欲探究和表现的，一方面是人性之美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现代智能条件下对理想化社会构建路径的倾力探寻。

在具体展开对上述命题的分析之前，我们不能不厘清的

刘诗伟的长篇小说《一生彩排》以其深刻的内涵和新异的艺术形式，在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显示出独特的探索价值。小说聚焦刘虹女失踪之谜、小刘虹女身世之谜、刘虹女墓碑之谜三大悬案，在对三大悬案的逐步追溯与挖掘中，作家以精神侦探的方式探寻人生世相中由真实与虚无、理想与现实、美善与丑恶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生命精彩。小说具有强烈的悬疑叙事色彩，作家透视复杂的社会关系，在饱满的叙事张力中展示人性向善向美的内在渴求。小说中设置的三大悬案看起来扑朔迷离，却是作家忠实于生活的结果，是作家对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命困境所提出的生命诘问与精神分析，他力图在美善与丑恶交织的人生世相中探寻人类向善向美的可能性途径。

这是一部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我们”的“一生彩排”蕴含着深刻的主题意向，是对一代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理想主义生存方式的精彩呈现。面对人生的精神困境，小说中的“我们”在“美”突然消失的现实里疯狂着、迷失着甚至堕落后，但“我们”对“美”始终保有真诚的信仰。“我们”难以直面突然失去“美”之后的人生残局，凭着现实理性进入社会各自打拼生存。虽然“我们”被社会生活中的丑陋与邪恶所腐蚀，但曾经被“我们”视为信仰的刘虹女早已将美善的种子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清醒于“美”作为信仰的力量，始终守护内心的纯洁，李冬对“美”的守护与孙秋致力于“万治优选法”便是证明。因“美”的主动隐匿，“我们”一度迷失于盲目的人生追逐，又随着“美”的种子不断在内心生长而回归自我存在的诗性价值。小说中刘虹女作为“美”的消失具有象征意义，“我们”所追求的是“应该有”的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是在逐渐靠近美本身。

小说中的三大悬案既是一个叙事迷宫，映照现实生存的斑驳图景，也指向一个引人入胜的精神栖所，“我们”为“美”的幻影而迷狂，因对“美”的迷狂而达到生命的充实。在追溯刘虹女墓碑之谜的过程中，“我们”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既是解脱亦是升华，其中蕴含着“我们”逐渐所理解的人生真谛。似乎在生命的无解之中，有一种清醒的力量在召唤“我们”赶赴对生命完整性的理解，人作为自我个体的存在应抵达对理想生命形式“应该有”的觉悟之中。一生彩排，就是不断地追求，就是不断地觉悟，也是不断地趋向完美。

《一生彩排》以悬案开始、以悬案结束的叙事形式具有强烈的悬疑氛围感，一方面小说中的场景设置和情节推进与当代社会生活高度契合，一方面又带有溢出现实生活的幻美感。小说亦虚亦实，真实是小说的内核，幻美与荒诞是小说的表现形式，真实、幻美与荒诞混融所形成的艺术世界对称于“我们”对“美”的渴求、追求与守护，这使小说具备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读者自然而然地跟随随着作家的叙述节奏去感受艺术世界中人物的传奇命运，也使读者在深思之中对生命更多一份犹疑中的凝视和反思中的深情。因此这是一部极好看的小说，却又不止于好看，在好看之中不时有停顿、有回返，有向往和充沛的热情，读者会感受到“一生彩排”

一个问题，就是刘诗伟所采用的到底是一种现实主义抑或现代主义的书写方式。开始，从一种阅读惯性出发，我是把小说当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加以看待的。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感知在不断生成。比如，作为核心的故事脉络，以赵春、钱夏、孙秋、李冬四人（大学同学、异姓兄弟）为代表的一众男性何以持续34年之久对失踪的刘虹女不能忘怀？虽然刘虹女是一个美丽的女神级人物，一般情况下，一位美丽出众的优秀女性被众多男性所追求并被惦记牵挂，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但赵、钱、孙、李四人及南平小城那么多爱过刘虹女的人在历经34年年后，依然深深怀念刘虹女，毕竟超出了常规的生活经验，不能不令人追究。又比如赵、钱、孙、李四人因为自大学期间就极端倾慕追求刘虹女，在强暴刘虹女未遂案中成了嫌疑人，在那个年代，在刘虹女引发“美的风波”之际，身为公安局刑警队长而同时追求刘虹女的武永强将他们拘捕起来，让他们在“号子”里坦白交代或互相揭发。他们被无端关押半年后释放，由于得到昔日大学“老师”、现任县领导的关照，公安局给他们的单位说明情况，“关押”之事对他们各人的工作并没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可因为失去了共同的追求对象（刘虹女于当日出走），他们急于寻找出走的刘虹女，也没有去司法机关讨回应有的公道。这更是非一般经验可臆想的奇异叙事。还有就是1982年秋日的那个晚上，南平师范学校校园里刘虹女遭遇歹徒时的尖叫声惊动了南平县城，可她没有想到，事后她的大学同学赵、钱、孙、李四人竟被作为嫌疑人被关押了，眼看一场“美的风波”正在恶性发展，为避免包括赵、钱、孙、李四人在内的南平人因她引发更多争斗，她于4月1日愚人节悄然离去，在制造一场自杀的假象后留言告知公安局刑侦队长武永强，直到34年后，赵、钱、孙、李发现她当年出走时以他们四人的名义在自己的人生出发地自立了一座墓碑，她原来并没有死。凡此种种，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的现实，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小说是在“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既如此，我们就不应该把《一生彩排》简单地看作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只有把它看作是一部带有突出现代主义色彩的寓言化书写，方才算得上是抓住了文本的关键所在。

且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命名，其姓名都带有突出的抽象与

象征化意味。比如那位一直作为文本聚焦点存在的刘虹女，顾名思义，所谓虹女，也就是像彩虹一样的女子的意思。彩虹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虽然美丽无比，但又总是稍纵即逝或时隐时现。如此情形特别切合刘虹女在作品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特点。究其实，作者之所以如此幻化地处理和描写刘虹女，主要是想把她刻画为一个抽象的美的化身。这一点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刘虹女的消失之谜被揭开后的一段叙事话语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一切都跟美有关。美是人人皆可加入的战争。这样的战争通常以耗费生命的方式让美消失殆尽，而现在换了一个结局——以美的主动消失解散战争。然而美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失败：刘虹女消失后，至少我们四人一直在寻找刘虹女，她其实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三十四年，她把我们将带出潦倒的社会，带到鸽子坪的荒岛，带进原生自然，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美……我们因此与她殊途相见。”歌德曾有言曰，伟大之女性，引领我们前行。简单地套用这一句式，假若刘虹女可以被看作是抽象意义上美的化身，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令人惊叹不已的美，同样能够引领我们前行。这是一种生命美学的书写。再比如小说中另外四个主要人物的命名，他们分别姓赵钱孙李，他们的名分别是春夏秋冬。当作家以如此方式给人物命名时，一种借助于抽象而体现普遍的意义也就昭然若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赵春、钱夏、孙秋、李冬他们四人是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莫如说更是一种具有类型特点而更为鲜明的一个时代的人物形象。

依照一种基本的情节逻辑，正是因为有了如同刘虹女这样一位美的化身的强力导引，才有了赵春、钱夏、孙秋和李冬他们四个异姓兄弟的友情构建。首先聚焦于刘虹女被强奸未遂后意外失踪的上卷。发生于1983年的这段故事表明，如果不是刘虹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平师范学校工作，那么也就不会有同样毕业于江城大学的赵、钱、孙、李四人紧紧追随至南平以及隔河相望的北原这样的事实形成。一方面，赵、钱、孙、李他们四人固然互为一厢情愿的假想情敌，但另一方面，当他们被迫面对同样在疯狂地爱着刘虹女的如同武永强这样的地方强势男性追逐者的时候，又不约而同、同仇敌忾地不自觉结成了统一战线。尤其是因为有作案嫌疑，刘虹女被强奸未遂案发后，他们四人一起被无端拘禁



艺术迷宫里的生命精彩

——读刘诗伟长篇小说《一生彩排》

□吴投文

背后人物的精神挣扎和挣扎之后的重获新生。这就是小说主题的厚重之处，站在生活的原点向远处看，看到的才是真正具有情采与诗意的生命形式，这样一个人活着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刘虹女在“我们”的生活中突然消失，这意味着“美”的消失，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在此后的人生中带着这个问号时时考问自己。小说的情节结构布满悬疑，在“我们”凝视人生远景的目光中，刘虹女作为美的象征始终是一种召唤的力量，吸引“我们”省察自己的人生。小说浓烈的悬疑氛围首先来源于刘诗伟对故事情节的独特编排，小说中情节画面的呈现具有一定的荒诞性，但并未脱离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形。小说情节的荒诞性忠实于人物的理性自觉，“美”作为“我们”的信仰，尽管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但却是“我们”求索人生价值始终不舍的源泉。刘虹女的众多追求者（包括“我们”）对刘虹女的痴迷几近癫狂，有的甘愿抛下自己的人生安排，来到刘虹女生活的小城“逐虹而居”。所有的追求者都痴迷于刘虹女的高雅之美，这种义无反顾的追逐似乎与塞万提斯笔下堂吉珂德的荒诞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荒诞带来的强烈冲击与故事情节的悬疑之间相得益彰。

“我们”在现实真实的场域里等待和寻找着悬案的真相，实质上，这是“我们”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确认和对生命之美的深切体悟。刘诗伟对故事情节进行荒诞化处理，其目的在于对照现实社会的真实情状而把人物的荒诞行为提升为一种皈依于美的理想化的生存状态。“美”的主动隐匿

迫使“我们”回归现实理性，而当“我们”历经官场商海的浮沉、功成名就之后，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愈发使“我们”感怀曾经追逐“美”时的那份纯粹与真挚。“我们”的行为看似荒诞，实质上是在追逐生命中那幻美的光环，是在对美的追逐中完成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确认。在此，荒诞的实质是“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对称于生存的诗性之美，以调试“我们”的内心渴求而朝向高远的幻境。这是一种趋赴至高之美的生存方式，“我们”为“美”而放弃世俗观念，也因趋赴于“美”而收获更多。

《一生彩排》采用全知叙述者的“外视角”方式自由组合情节画面，小说中情节画面的呈现具有较强的跳跃性与镜头感。面对当代社会极其复杂的情状，刘诗伟以简练的艺术技巧将故事内容浓缩在每个人物视角的镜头之中。小说情节画面的跳转带有时空变幻的恍惚之感，主要是为推进悬案的发展，就叙事文本整体而言，意在强化小说的悬疑氛围。米兰·昆德拉说过：“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简约、浓缩的技巧。”作家无法将包罗万象的现实社会全部纳入自己的叙事世界之中，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文字里呈现现实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对作家的文字功底与叙事技巧是一大考验。刘诗伟的叙事技巧表现在对情节画面的精微把控中，看似随意组合的故事画面，其中却蕴藏着作家对复杂世界的深人体察。“我们”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情节画面在“我们”各自的叙述中跳转，“我们”与刘虹女的人生经历以片段式的情节画面来呈现，各自的人生历程中交错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刘诗伟将叙述视角的镜头聚焦于

各种社会关系中，“我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移、纠结，内心充满冲突，为实现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憧憬美与美的生命形式。故事情节的悬疑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底色，人物的命运符合各自的性格逻辑发展。情节画面的跳跃性与镜头感有利于营造小说中的悬疑氛围，也契合读者的期待视野。一般来说，运用象征手法能使小说文本产生言尽而意未尽的表达效果，实现小说文本思想情感与精神意蕴的绵延，可以使小说表达的主题显得更加深邃。《一生彩排》的象征意味极其强烈，人物及人物行为所包含的象征意蕴是多层次的，不只是拘囿于个体生命的精神疑难，更重要的是叩问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刘虹女实际上是美的化身，她的美善及其所体现的人性光辉与神话传说中的虹女、鸽子坪的彩虹和鸽子花联系在一起。她象征人类致力于追求的自然之美与纯粹之美。但这也正是刘诗伟的忧虑，人类对自然之美的破坏和对纯粹之美的疏离已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他试图重新回到一种健朴而又包含神性的价值观，因此把自然之美与纯粹之美统摄到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刘虹女身上。“我们”及刘虹女的众多追求者代表着迷失于“美”的虚无之中的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强烈渴望获得“美”、拥有“美”，却又疏离美之为美的实质，并不能真正理解刘虹女所代表的超离世俗欲望的美之精神。他们在强烈的获取欲望中以遗忘自我个体存在作为代价，反而离“美”愈远。刘虹女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身而退，不知所踪，这既是

现实压力施加于她身上的结果，也代表理想与美的失落。“我们”一度依从现实理性求取生存的物质需要，但刘虹女总在唤醒“我们”内心皈依于美的冲动，使“我们”难以彻底背叛曾经有过的青春理想。小说中的三大悬案压在“我们”的内心，在象征的意义上，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生命的反转，要求“我们”重塑生命的价值。刘虹女墓碑之谜实际上最终并未破解，失踪的刘虹女并未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象征“我们”重塑生命价值的过程并未结束，“我们”在“一生彩排”的过程中仍然面对新的考验。

《一生彩排》中人物的表面行为是执着于寻找悬案的真相，而其象征意义则指向美在“我们”内心的重新觉醒，指向一种健全的生命价值观。刘诗伟为物及其行为所赋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小说的主题，一方面也使小说中的悬疑氛围更加浓厚。小说的象征意蕴并不是作者刻意强化出来的，而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与小说的深层结构中凸显出来的。“我们”与刘虹女之间具有对照性的意义，经由这一对照，更加凸显出刘虹女的美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

长篇小说作为典型的叙事艺术，一个重要特点是较大的时间跨度里将不同人物的性格命运呈现在时代的纷纭变化中，展现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这需要作家综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实现。《一生彩排》中故事情节的奇特编排、情节画面的自由跳转以及象征手法的纵深运用，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面对信仰缺失时心灵的惶惑、精神的挣扎以及最后情感的释然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围绕三大悬案铺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展开人物之间互成对照的戏剧化生存图景，在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83、2000、2017）呈现人物命运的变化，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幽暗深微，在时代的纷纭变化中把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气质表现得回肠荡气，韵味悠长。虽然小说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在结构处理上却有内在的统一，小说的表层结构贴近时代的世态人情，深层结构则指向世态人情背后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小说的思想深度亦从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互动中彰显出来。小说在情节处理上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细节刻画显示出葱郁的时代氛围，在悬疑氛围中处处透出人性的光彩。人物之间的相互纠结更多的是不是矛盾冲突，而是因为美的召唤而共同趋赴精神层面的完整与丰富。

刘诗伟的小说语言讲究雅致之美，表现在《一生彩排》中，就是与小说的情节画面相互交融，也与小说的悬疑氛围圆融相通，因而呈现出一种极具个性化的表达效果，既具有哲理的内核，也游动着诗性的新奇。他的这种语言风格也颇能表达小说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深度，贴近笔下人物的浪漫诗性气质。他采用雅致的语言为悬案解码，更具一种陌生化了的表达效果，使小说中的悬疑氛围带有幻美的情采。显然，在小说的文体风格上，刘诗伟深思熟虑，他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营造一种艺术迷宫的效果，在适度陌生化的情境中求解生命的精彩，印证一代人守护理想主义的生存价值。

现实压力施加于她身上的结果，也代表理想与美的失落。“我们”一度依从现实理性求取生存的物质需要，但刘虹女总在唤醒“我们”内心皈依于美的冲动，使“我们”难以彻底背叛曾经有过的青春理想。小说中的三大悬案压在“我们”的内心，在象征的意义上，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生命的反转，要求“我们”重塑生命的价值。刘虹女墓碑之谜实际上最终并未破解，失踪的刘虹女并未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象征“我们”重塑生命价值的过程并未结束，“我们”在“一生彩排”的过程中仍然面对新的考验。

《一生彩排》中人物的表面行为是执着于寻找悬案的真相，而其象征意义则指向美在“我们”内心的重新觉醒，指向一种健全的生命价值观。刘诗伟为物及其行为所赋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小说的主题，一方面也使小说中的悬疑氛围更加浓厚。小说的象征意蕴并不是作者刻意强化出来的，而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与小说的深层结构中凸显出来的。“我们”与刘虹女之间具有对照性的意义，经由这一对照，更加凸显出刘虹女的美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

长篇小说作为典型的叙事艺术，一个重要特点是较大的时间跨度里将不同人物的性格命运呈现在时代的纷纭变化中，展现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这需要作家综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实现。《一生彩排》中故事情节的奇特编排、情节画面的自由跳转以及象征手法的纵深运用，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面对信仰缺失时心灵的惶惑、精神的挣扎以及最后情感的释然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围绕三大悬案铺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展开人物之间互成对照的戏剧化生存图景，在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83、2000、2017）呈现人物命运的变化，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幽暗深微，在时代的纷纭变化中把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气质表现得回肠荡气，韵味悠长。虽然小说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在结构处理上却有内在的统一，小说的表层结构贴近时代的世态人情，深层结构则指向世态人情背后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小说的思想深度亦从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互动中彰显出来。小说在情节处理上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细节刻画显示出葱郁的时代氛围，在悬疑氛围中处处透出人性的光彩。人物之间的相互纠结更多的是不是矛盾冲突，而是因为美的召唤而共同趋赴精神层面的完整与丰富。

刘诗伟的小说语言讲究雅致之美，表现在《一生彩排》中，就是与小说的情节画面相互交融，也与小说的悬疑氛围圆融相通，因而呈现出一种极具个性化的表达效果，既具有哲理的内核，也游动着诗性的新奇。他的这种语言风格也颇能表达小说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深度，贴近笔下人物的浪漫诗性气质。他采用雅致的语言为悬案解码，更具一种陌生化了的表达效果，使小说中的悬疑氛围带有幻美的情采。显然，在小说的文体风格上，刘诗伟深思熟虑，他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营造一种艺术迷宫的效果，在适度陌生化的情境中求解生命的精彩，印证一代人守护理想主义的生存价值。